

一曲属于新世界的歌

——评杨少衡长篇小说《新世界》 □陈弘



贝多芬把席勒的诗歌《欢乐颂》化成气势磅礴、意境恢弘的《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杨少衡在他的长篇小说《新世界》里用一只小小的口琴表现这一乐章,演绎了一曲属于新世界的“杨版”《欢乐颂》。

《新世界》一开篇并没有“欢乐”可颂,一场赤裸裸的暗杀和两只“大鸟”(敌军轰炸机)对县城制造的“九二五”惨案接踵而至拉开小说序幕。“我”在近70年后寻访到当年遗址上的一座石雕:“一位卧伏于地的年轻农妇,抬起上身将手掌挡向天空,似乎要阻止什么。一个小男孩从农妇腋下露出半个脑袋,表情茫然。”石雕底座上的文字说明这里就是以身救儿的农妇蒙难处。

《新世界》顾名思义讲述的是从“旧世界”嬗变为“新世界”的故事。已经为解放军占领的闽南某县在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星期遭此横祸,死伤近百人。从而围绕我双方阵营的你死我活的较量,铺展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环生险象。故事发展的脉络始终紧紧围绕着县民政科科长侯春生、公安局长郑勇和县长陈超,同敌方潜入的特派员“橄榄核”、本土潜伏特务“B-29”以及面目模糊的旧县政府军事科长连文正、独立团团连长连文彪和带着一个一岁半孩子的年轻女子徐碧彩之间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胶着战而向前延伸。从“九二五”空袭、敌特暗中鼓动“天光反”,化解文庙敌伤兵暴动、捉放徐碧彩、对连文正反反复复心理攻到“溪坝事件”、侯春生“刀下留人”刑场急救连文正、连文正真面目暴露杀人逃跑被炸身亡,直至野鸭铺歼匪击毙敌特派员“橄榄核”,小说的上篇把以侯春生为代表的“新世界”同连家老四连文正为突出人物的“旧世界”环环相扣的血腥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下篇紧紧衔接上篇的矛盾冲突,让“新世界”同连家老大连文彪为代表垂死挣扎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残酷地白热化:从空降“不速之鬼”、追击“林长官”的空降小组、吴铁板母子惨遭杀害到徐碧彩被土匪抓走又脱险、连文彪公然叛变、侯春生遇险逢救、叛匪围攻县政府、北山匪巢抢粮陷陷阱以及侯春生壮烈牺牲,直至两个月后全歼匪特,这一部险象环生扣人心弦的好看小说也落下了帷幕,尽管还留下几个“谜团”。

看完小说,抚卷沉思,假如作者的笔触仅仅在这个层面进行叙述,小说可能又是一部好看的“剿匪记”。然而笔者顽固地认为,虽然《新世界》讲的是新旧世界交替的白刃战,但无论是“新世界”的创立者抑或“旧世界”的捍卫者,都不是小说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小猴子,胡萝卜们,是新生共和国的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这才是作者赋予“新世界”的真正含义。

这是杨少衡小说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尽管杨少衡的所有小说都直接触及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主题,但同时,他在艺术上又与我们时代的一般趣味和一般思维习惯保持着一个遥远和寂寞的距离。”评论家李敬泽先生的评价主

要是针对杨少衡的“官场小说”,但对于像《新世界》这种作者并不多见的非“官场小说”,笔者认为同样也准确。

没有任何音乐天赋的侯春生硬是要吹被战友调侃为“破牙刷”的口琴,“行军路上他学吹口琴,使上全身之劲,听者无不笑话,说他拿个破牙刷杀猪,那猪崽不歇气地尖声叫唤,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侯春生并不气馁,每晚杀猪不止”,“他相信自己可以吹好,因为他心里有那种声音。”哪种声音呢?原来他12岁时在北方老家听一群与他年龄相仿的抗日宣传队的孩子登台唱歌。“他们穿小军装,模样像小八路,在一个大人指挥下表演合唱,嘴巴一张,侯春生就着迷住了。后来他总是说,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是孩子们的歌唱,那就是天籁之声。”是孩子的歌声扎根在他的心底,抑或是父母双亡后一个10岁的孩子两眼巴巴看着三个年幼的弟妹一一夭折刺破了他稚嫩的心,或许是两者皆有把音乐与孩子融化成滚烫的一体注入了他的血液,总之,“破牙刷”和孩子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或历史的组成“器官”,伴随他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最终走进革命历史博物馆,当然孩子们没有成为文物,一代又一代的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破牙刷”。

侯春生这个形象承担着小说《新世界》主题思想的生发与演绎。为了小猴子的存活,侯春生几次出生入死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以至于因为连文正协助他在空袭中救护小猴子而一直对连存有片面认识,他请求不要公审、枪毙连文正,认为“连文正曾是敌军军官和地方官吏,也曾参加抗战打过日本,近期协助群众躲避空袭、遣散伤兵,都很努力。连文正还曾帮助他躲过敌特黑枪,关心他的安危。因此他感觉连文正不是敌人”。受到县长陈超批评,侯春生还坚持己见:“如果错了,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处分、开除直至枪毙,都可以。”连文正杀人逃跑让侯倍感震惊与懊恼,却初衷尤在。

对谎话连篇的徐碧彩,侯春生从追问“五线谱”到发现她懂音乐、会吹《欢乐颂》,就不能自己。小说里徐碧彩“暗暗吃惊。始终一脸严肃的审讯者听到口琴声突然变了个样子,只见他把头仰起,看着审讯室的天花板,静静听曲,非常投入。她又吹了一遍曲子。侯春生一声不吭,似乎听入迷了”。侯春生问徐:“可不可以用这把口琴伴奏,让孩子们来合唱这支歌?”在他的心目中,音乐与永远不老是密不可分的。而侯春生更为关心的是徐碧彩带着的那个一岁多的胡萝卜,或者说他对徐碧彩的身份犹疑未定,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胡萝卜?

在整部小说中,侯春生几番闯入敌阵,面对真枪实弹的敌特土匪,接连伸出援手,搭救连文正与徐碧彩,所作所为出于本性,更出于他对“新世界”的认知。最终他在生死关头放弃处决眼前的被擒之敌,导致自身的牺牲,根本原因还是他心中的“天籁之声”:他不想让胡萝卜目睹血腥的一幕而惊惧终生。

侯春生心中的“天籁之声”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当连文正指出“眼下还是枪炮声最为真实”时,侯春生断言:“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枪声,它应当被更好听的,新世界的声音取代。”他觉得新世界是所有人的,特别是孩子们的。他所做的一切,说到底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幸福地歌唱。他觉得所有人都可以为之努力,包括连文正。

“无论他将遇到什么,新世界已经如太阳喷薄而出,这就够了,相比起来个人际遇不算什么。他还可以努力,可以工作,闲下来还可以‘刷牙’。他相信不懈努力必有进步,有朝一日他会把一群孩子叫到身边,让孩子们歌唱,他用口琴伴奏,那一定是天籁之声,新世界里最动听的声响。”

即使是行将被活埋,“那一刻他的心情竟非常平静。他抬眼看着天空,夜空漆黑,不见星星闪烁。但是他知道经过一个黑夜,太阳还会升起,那是新世界的太阳。明亮的阳光会照在所有人的身上,小猴子和胡萝卜也会在阳光里。”

这就是侯春生的“新世界”,一个70年前为新中国而献身的年轻革命者心中的新世界。这也是《新世界》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里的歌属于侯春生,属于我们,更属于阳光下的孩子们。记得杨少衡早年的中篇小说《俄罗斯套娃》有一句话:“阳光是个啥?”他用小说加以解答,并且说:“我从心里盼望阳光普照,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有此诉求。”

写完王士禛,瞩望窗外,细雨蒙蒙,绿柳婆娑,这天正是谷雨。

远树无枝、远水无波,沉浸在这诗意的窗外画景中,我多么想与三百多年前的渔洋先生再做一次时空的对话:先生,我不能面对面聆听您的教诲,只能在文字的沙海里爬罗剔抉、参互考寻,为的是一步步接近您,探寻那些时空中稍纵即逝的灵光、幽奥和悬微。我知道,我是站在研究您的众多学者的肩膀上与您对话的,我用键盘敲出的这些字,用这些字拼成的大餐,酸咸之外,是否合乎胃口?您说,诗的韵味在酸咸之外,其妙处在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评传却必须明昏启聩,做出结论性的判断。好在我是尽力的,那个缥缈无定的神韵诗说,我自感触摸到了它的脉搏。期待,那个时空中的您,也能给我投来温柔敦厚的一笑。

接受这个任务,是在五年前,为了与渔洋先生有更多接触的机会,我尽力在工作之余,沿着他的足迹去触摸他走过的大地,抚摸他曾经抚摸过的瓦木砖石。

渡清远峡,来到广东清远人迹罕至的飞来寺,去感受渔洋先生所谓“石壁留孤云,飞亭俯江色”的壮丽。在“鸟啼倚修竹,花覆濛濛水”的亭栏处,远眺江水,船舸点点,便真的有了“逍遥问摩诘”的滋味了。

山西榆次什贴镇的旅店可能是我住过的唯一一个乡镇级的旅店,一夜二十元钱。在王士禛的时代,这里却是一个重要的官驿,西来东去的官员几乎都要在此落脚。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禛主试四川乡试,就曾在在此驿站停留,并在当地官员的安排下,看了一场射箭表演。傍晚,在过访一个荒寺之后,我们来到断崖旁,那条官道就在我们的脚下。抬眼望去,崖深丈许,蓬蒿满崖,几只大鸟自崖对面飞来,叫声悠扬,那回音自谷底传来,又随远方白云,簌然散去,似是一个遥远的致意,而这致意却直戳心底。我在想,莫非渔洋先生还在这里?

感谢黄裳堂总编对我的信任,让我能与王士禛这样一位大师做五年充分的对话,也让我把明末清初的历史撕开冰山一角,幽烛探微,对其中的一些许人物、事件做历史与现实的深切观照。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读史的乐趣,也得到了知识的充实和现实的感悟。

渔洋是一位诗人,同时,他还是一位官员,而且是一位高官,二品。历代有影响的诗人中做到他这种高度的不多。也许是他将诗法与处世之法相统一的结果。

渔洋一生中有多次被降级、撤职和罢官的经历。幸运的是,每一次,他都有山水之助,在山水之间洗涤烦恼。渔洋是不幸的,不到成年就目睹家族涂炭;渔洋又是幸运的,他有那样好的祖父和一个开明的皇帝。以他的天资和温柔敦厚的禀赋,能进对了门,跟对了人,当然是一片前程锦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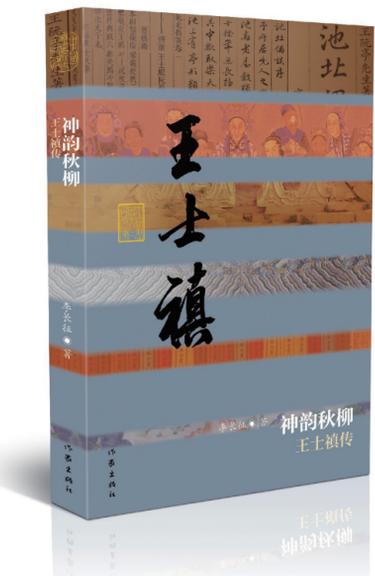
渔洋一生的爱好无非是写诗、读书、山水和交友。他生活的圈子,使他可以尽情地挥洒才华,留下风流华章。得意时,他能诗酒唱和;失意时,他可以遥望天空。他深信“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道理,当他必须面对时,他可以在公堂上铁面无私;当他需要回避时,也可与陈焯一天胡扯。即使好朋友来借钱,他也没有豪举,而是由夫人褪下腕上的手镯;即使如赵执信辈,骂到他的脸上,他也没有激愤之情,而是淡然一笑,不做回应。渔洋的韵味确在于此,写完此书,他留给我的是一个淡淡的笑容,那样亲切,那样敦厚。这不露声色的一笑,如光如电,如梦如影,让当世的人去体味、去思量。这种风流是一般人所难以达到的。所以说,渔洋是个奇人,打仗,他行;打牌,他也行。

渔洋一生讴歌忠烈,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忠烈是他人格的基石。无论是椒山祠前还是五人墓旁,无论是国士桥头还是杨慎故宅,每到一地,他都要在忠烈面前做流连慨叹。有了这种人格的基石,王士禛便能舞动处世的太极,打起灵魂的乒乓,在你推我挡之间,保护自己,成就别人。所谓成人达己,内圣外王是也。

人们对清代的文学成就似乎仅仅专注于《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以至于清诗常常被人忽视。清人焦循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认为各个朝代都有巅峰的文学样式,如汉魏大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殊不知,这种观点误导了人们对传统诗歌在清代地位的认识。在清代,由于有了如王士禛这样嗜诗如命的人,清诗成为了中国诗歌这一最古老的文学样式的集大成者,但是集大成的顶峰在哪里?在此,我还是引用著名学者胡怀琛的观点,即在王渔洋!

《神韵秋柳——王士禛传》跋

□李长征



胡怀琛先生有一本著作《中国八大诗人》,继屈、陶、李、杜、白、苏、陆之后,第八大诗人,就是王渔洋。何以如此?综合诸多学者和胡怀琛先生的分析,我认为:一、以王士禛“我本恨人,性多感慨”的天性,他找到的最好的抒情方式自然是诗歌,即说王士禛有诗人最好的基因。二、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字传承的最晚期,传统的积淀已经非常深厚,王士禛先学唐后学宋、学宋后又宗唐,使他能兼收并蓄。清以后,进入白话文时代,再也没有古诗歌得天独厚的土壤了。同时,满人尊古、复古,这是清代训诂和学术飞速发展的根本,而诗歌也得以在古文字中汲取更多营养。王士禛科举出身,自然在古文字的浸润中出类拔萃。所以,中国诗歌最好的土壤出现在清代。三、中国诗歌讲究含蓄、婉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像外国诗歌那样直接,而这正是中国诗歌的正宗传统,以诗教化,可诗教也。王士禛诗风的温柔敦厚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学说,正是中国诗歌的正宗传承。

从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看,清诗是中国诗歌的集大成者,从王士禛生活的时代和他的诗风看,王士禛是中国诗歌的正宗在有清一代发展的巅峰。

渔洋是位诗歌大家,他的典、远、谐、则之说是诗歌中的瑰宝,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神韵,正如中国画的水墨韵味,与西洋画的逼真写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流派。水墨就是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中国味道,在渔洋诗文中浸淫,领悟其美、其妙,又能生发多少文化自信!

渔洋除了是一个诗人、官员,还是一个诗论家,他的神韵诗说光照中国文坛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神韵的精髓在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要说透这个理论却是万言也难道尽的。渔洋一生参禅学佛,其思想博大精深,我也力图以讲故事的方式增强其可读性,至于效果,只有让读者评说。

我庆幸能在王士禛这片思想和艺术的沃土上深耕细作,五年来,我汲取的营养会受益终身!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用这种新闻体来写作,是因为我的新闻经历。前面加上导语,可能也是职业习惯。同时,为增强可读性,我在书中加入了在王士禛和诸多清人笔记中所见到的故事,当是作传记文学的尝试。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家人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父亲八十一岁高龄还不断为我找来资料,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能永远给我鼓励和关心。同时,我还要感谢纪冉、魏恒远、曹瑞刚、朱斌、李兆山、叶思平等朋友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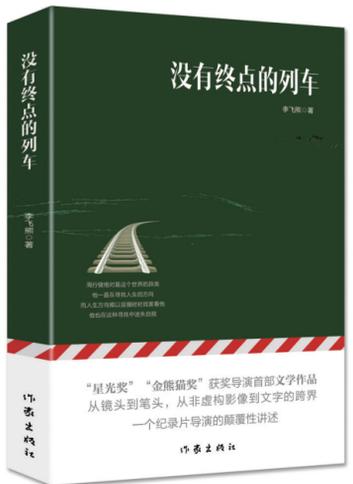
夜朗气清,柳影摇曳,遥望天际,叹问渔洋。至此搁笔,作一小结,以慰五年搜罗奔波之苦,以慰一年码字费神之劳。

(摘自《神韵秋柳——王士禛传》,李长征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无果的寻找

——读小说《没有终点的列车》

□郭欣然



种社会与家庭认可的“稳定”来使自己的婚恋有所附丽。当她羞于向父母说出周行健是“自由职业者”,而谎称他“在国家电视台工作”时,恋人之间价值观的分野已经昭然若揭。在恋爱中,周行健不断让渡自己的“精神主权”,甚至向林紫涵所遵循的“孝道”妥协。寻找爱情,使周行健的精神世界在“自我”的模糊中变得锈迹斑斑,他非但没有获得救赎,反而被推到了另一种迷惘中。

小说《没有终点的列车》刻画了迷惘的青年群像。周行健、马洛等青年们成长于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丰富的文化资源扩展了他们的精神视野,赋予他们强烈的个人意识与自我追求;另一方面,当他们踏上社会舞台时,由商品、资本构建的社会秩序已然稳固,物质社会的壁垒使青年们的诗意理想与家国情怀无的放矢。在众神隐退的时代,留给这群零余者的生存空间逼仄而局促,他们只能在迷惘的社会空气中不断找寻出路。小说所展示的,正是迷惘一代的苦苦求索。

透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周行健们在诗意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挣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游荡,在灵与肉的纠葛中找寻自我……最终,有人疯癫,有人堕落,有人则仍要坐上一辆没有终点的列车,在时间与空间的延宕中寻找救赎之道。这群青年人于无声处“号叫”,于无地彷徨,但没有谁能撕裂迷惘的空气。物质的碾压、诗意的溃败,使他们原有的生命活力日渐消散,留下的只是一具具承载着苍老灵魂的年青肉体……小说情节由顺叙与倒叙交叉推进,在回中时,周行健、马洛、吴先锋、王立言等多位性格迥异却同样身陷迷惘的青年,展开了各自的求索之路。

小说的开端近乎荒谬:周行健与马洛二人在深夜的北京街头寻找一个诱人的“屁股”,这场寻找却因肉欲与审美的对立而以失望告终。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开端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没有终点的列车》的机杼,即“寻找”,或者说无果的寻找。藉由“寻找”,小说勾勒了精神与物质、爱情与自我、传统与现代矛盾、混杂的社会图景;种种无疾而终的寻找相交,矛盾与迷惘的空气也借此跃出文本,萦绕于读者心中。

周行健、吴先锋、王立言等年青人,出于对“诗意生活”、“家国理想”的寻找,纵身跃入都市漩流,汇集于北京这一城市舞台上。而正是在对理想的寻找中,个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

愈发明显,他们见证了诗意的消逝、理想的破灭:艺术被商业蚕食,诗歌变成了仰人鼻息的宠物狗……“寻找”,似乎只证实了寻找之无果,除了迷惘,他们一无所获。面对个人与社会难以调和的龃龉,他们只能继续寻找迷惘的出口。为了维系残存的诗意,周行健不得不依赖于商品社会所提供的经济保障,制造满是噱头的电视节目,因而不自觉地成为了他所憎恶的“物质”的帮凶。但在物质社会的碾压下,他只能如此矛盾、艰难地滋养着自己的精神园地。马洛则追寻着“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指引,他钟情于金斯伯格的诗歌,以充斥着器官与欲望的书写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号叫”。这种不羁的精神回归也塑造着他的生活方式,当马洛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时,他的诗意理想也在无形中遭受着磨损。

青年们不断地寻找理想的救赎,但得到的只是更加深重的迷惘。这群叛逆者们也试图反击令他们陷入迷惘的社会,可在重重束缚下,他们已然失去了“反抗绝望”的绝决,所能做的只是“撒把野”,比如对着石像撒尿,或是酒后在大街上脱下裤子,以人体最肮脏、最隐秘的部位屁股睥睨这个冷漠、荒凉的时代。但“撒野”一词既出,也彰显了青年们与社会秩序的不对等关系,他们的反击只是小人物无济于事的挣扎,是后青春期的叛逆,最终无法撼动由商品、资本结成的无物之阵。

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对峙中,对理想的寻找使得周行健们深陷迷惘,他们又试图追求爱情,期望以情感的慰藉来获得救赎。但这群极具自我意识的青年们没有预想到,由婚恋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不能完全容纳他们张扬自由、追寻自我的个人意识,因而以寻找爱情来拯救迷惘也注定是一场徒劳。纵然恋人们在情与欲的交融中不断打磨着彼此,但身体的碰撞无法带来精神的贯通。林紫涵骨子里是个传统的女孩,即便她被周行健的诗意理想、自由精神所吸引,但仍需要一

杂的路径都在精心编织着迷惘时代中,个人、社会、物质、精神等对峙、交融的复杂氛围。“寻找”是勾勒这幅图景的线索,但不是小说的全部内容。在青年们不断的寻找之中,寻找本身的意义已被消解,作者的意图更倾向于通过描写寻找之无果,呈现个人与社会的迷惘之象。青年们因迷惘而寻找,却因寻找而再度陷入迷惘,他们西绪福斯式的努力展现了个人无法左右的时代之苦难,满含悲剧色彩的迷惘与求索为小说涂抹了一层厚厚的底色。

作者无心训诫,更无意歌颂,他以不事雕琢的叙事语言、清晰的叙事逻辑与戏谑的语调书写了社会与个人之迷惘这一沉重命题,其中也不乏诗意的思考与理想的抒怀,使得文本颇具精神深度。可以看出,作者无比珍视书写的权利,他没有为了取悦任何人而故作雕琢或滥用文字,更不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点染,而是将笔触深入到青年人的肌理之中,通过对周行健们迷惘心灵的摹写,展现出了苦闷社会的全部真实,其笔锋也超越于个人与社会之外,指向历史与时代的纵深处。通过对小人物生存境况的把握、对时代痼疾的揭露,也体现了物质社会中难能可贵的关切,从而使小说在审美价值之外有了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学有责任书写个人与社会的迷惘,展现心灵风暴、勾勒时代图景,但文学本身更需要走出“迷惘”,写出个人如何直面迷惘、逆流而行,在时代的多重变奏中找到精神方向。艰难求索的“迷惘者”形象,无论是在虚构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他们是“大胆而幼稚的叛徒”“觉悟慧”,是组织部中格格不入的青年人林霖,更是现今社会中扎根基层建设的知识青年……《没有终点的列车》向读者展示了匍匐于社会边缘、青春火焰渐趋黯淡的“迷惘者”形象,但我们更期望看到作者融合审美价值与精神指引的创作取向,为身处“寻找之路”上的人们提供刺穿迷惘、反抗绝望的勇气与精神力量。